



校长面对面

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徐飞:

让创新创业成为内在生长的基因和信仰

■本报记者 温才妃

和很多高校领导一样,徐飞有过很多头衔。然而,在众多的头衔中,他最愿意提及的是他曾在上海交大兼任创业学院院长。

对于创新创业,徐飞有着特殊的情怀。1998年徐飞博士后出站,一度曾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创业,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亲切接见。

除了担任过创业学院院长,他还是教育部创新创业教指委的创始委员、中国创新创业学会副会长、创新创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对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甚是了解。

如今,他是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如果要加上一个定语的话,他大概是一名“创业型校长”。那么,这样一位“创业型校长”又是如何解读创业与创新关系、大学生创新创业误区的呢?这让前来采访的《中国科学报》记者产生了好奇心。

“创”“业”的解读

“创业”是当下的热词,由此引申出的创业教育、孵化器等新词不绝于耳。可甚少有人琢磨“创业”二字的真谛所在。

在徐飞看来,对于“创”字的解读,可以从创业、创新、创造、创投、创意“五位一体”去理解。尤其是“创意”最为稀缺。

在科技纵横发展的当下,手写代替键盘,眨眼实现翻页……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事。而古人所说的顺风耳、千里眼,更是早就以电话、电视的形式实现。

“许多事情实现起来不难,关键在于不敢想、想不到。”徐飞举例,“功夫是中国的,熊猫是中国的,《功夫熊猫》却是美国的。这让中国人非常汗颜,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由于创意缺失,走出去的山寨品居多,对世界所起的引领作用有限。”

而创业中的“业”在他看来至少有四种解读,“不仅仅是去创办一家企业,去谋一份职业,更是一份事业,甚至是一份志业”。

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提出,应该视学术为一份志业。《说文解字》曰:“志,从心之声。志者,心之所之也。”

“志业是一种掏心掏肺、存在于骨子里如血脉一般的东西。这就要求把创新创业视作一种信仰,让创新创业成为一个人内在生长的基因。”徐飞说。

毋庸置疑,创新创业精神是时代呼唤的精神,对于新一代的年轻人更是如此。在徐飞看来,“创新创业需要坚忍不拔、百折不挠、永不言败的精神,需要工匠精神、挑夫精神和工程师精神,不能投机取巧。”

正是基于此,他把自己定位为创新创业型校长,其身后的西南交通大学不仅仅是一所研究型大学,他还要着力把它打造成为一所创新创业型大学。“要把创新创业变成全校上下乃至中国高等教育的共识,作为校长更要有这种情怀,持之以恒地把创新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通识教育有机结合,以此推动、带动并提升全社会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造能力。”

创业需要热心肠、冷头脑

去年5月,教育部一则支持在校大学生休学



“要把创新创业变成全校上下乃至中国高等教育的共识,作为校长更要有这种情怀,持之以恒地把创新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通识教育有机结合,以此推动、带动并提升全社会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造能力。”

徐飞

创业的政策,引起了高校乃至全社会的热议。

对于全国上下都在进行的创业“运动”,徐飞从来都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创业必须厘清‘热’与‘冷’。热的是心肠,冷的是头脑。”

在他看来,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有其规律。一般而言,第一步是就业,第二步是立业,然后是成业。通常,创业发生在就业甚至立业之后。实证研究表明,创业的最佳期不是求学阶段,而是就业工作若干年后。大学生在没经验、没人脉、更没有经济支撑,甚至心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想要创业成功是小概率事件。

总有人拿比尔·盖茨退学创业举例,却忽略了他创业初期也曾种种“拼爹”。实际上,即便像美国这样的创业大国,大学生创业的比例也不到3%。

“就全社会而言,国家的号召是正确的。但具体到细分市场、族群和对象,就要冷静、理性和平和。休学创业虽然在制度上允许了,但允许并不等于鼓励、提倡。”徐飞提醒,中国最值得警惕的是“运动”,如果高校校长、教师都不愿意自己的子女在学习期间创业,为什么要鼓动大学生在校期间去创业?做人要厚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谈过了“冷头脑”,让我们来关注“热心肠”。在什么情况下,大学生的创业应该得到支持?什么样的创业又应当鼓励大学生尝试呢?

徐飞表示,大学生的首要任务是学习。若少数同学对创业极富热情,又捕捉到难得的机遇,同时其他必需的资源也可获得,“对于这样的大学生,应支持其大胆创业”。

同时他还建议,大学生创业应以科技创业为主。开网店、咖啡屋当然可以,但与社会其他人群,如下岗工人、失地农民、转业军人等相比,创业的比较优势未能发挥。大学生应充分利用自身在知识、专业、科技、信息和智力等诸方面的比较优势创业,特别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有所建树,为创建创新型国家作贡献。

创新须强调创业精神

创新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和最强音,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也是政府战略和国家意志。然而,对于创新,人们却不免存在着许多的误解。

徐飞指出,误解一是把创新神秘化,认为创新是科学家、教授和高智商的人才能做的事,普通人没有能力创新;误解二是把创新庸俗化,为创新而创新,忽视内在的东西。甚至还出现“创新不驱动”或“创新驱动不动”,“不创新等死,创新找(早)死”这样的悖论。

产生这些窘境或悖论的原因有多重,比如:“对创新的认识偏差,科技创新主体错配,科学发现、技

术发明、产业发展‘三张皮’等。”徐飞如是说。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人们把创新看作灵光乍现、恍然大悟或神来之笔。可实际上,创新表面上呈现为灵光一现、幸运得之,但背后却是经年累月的艰辛探究和辛勤付出。因此,必须强调创新中的创业精神和脚踏实地。”徐飞说。

徐飞曾多次说过,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就要有“疯子”的梦想,加上“傻子”的坚持;要有“农民”的踏实,加上“猎人”的本领。对此他解释道,聪明人也要下笨功夫,创新需要求真务实,需要工匠般的吃苦耐劳,需要摒弃急功近利,需要认准时机百折不挠。所有这些,都是创业精神的精华和要义。

当然,创业也需要创新精神,如同创新需要创业精神一样,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把创业叫作‘傻子’,创新叫作‘疯子’,二者都不可偏废。必须把异想天开、天马行空和脚踏实地有机结合。”徐飞说。

创新创业,高校该做什么

创新创业是一种理念、情怀,来自于点点滴滴、丝丝扣扣,犹如“春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那么,高校在这个过程中要为其创造怎样的环境呢?

徐飞指出要注重四方面的结合。第一个要把专业“成才”、精神“成人”、创新创业“成就”三者结合起来。当前,部分大学已经没落成职业培训机构。面对就业难的困境,市场需要什么专业它就开设什么专业,这种只看眼前和当下的狭隘功利行为,严重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是人才培养在“精神成人”上的缺失。

第二个结合在于,把创新创业的理念、技能、实践结合在一起。理念应更多地纳入到课堂教育中,由教务处、研究生院负责;技能应由学校团委、学生处、创客中心或课外各类兴趣小组和社团负责培养;实践实战则主要放在大学生科技园、社会化机构、企业和雇主单位。

第三个结合是教师、讲师、导师“三师”的结合。教师主要由校内教授等课程老师担任,更多从创新精神、创业理念和创造能力上传授。讲师则从社会上的专业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的专业人士中聘请,主要讲授创业各阶段、各环节的实操知识、技能和“know how”。导师主要由已经成功创业的企业家或遍及海内外的广大校友担任,他们最清楚创业中的酸甜苦辣。

第四个结合则是“五课堂”的结合。“五课堂”中第一课堂指传统和现行的课堂教育教学;第二课堂指校内课外,各类文化、科技、文体、社团、公益、兴趣小组等各种活动;第三课堂指校园内校外各类社会实践、实习、实训和义工等活动;第四课堂指海外游学、访学、留学等海外学习和实习项目。第五课堂指易班(E-class)、MOOCs课程、云学习、翻转课堂等虚拟课堂和网络交互等e-learning学习平台。

前四个课堂是物理空间(Physical space)中的课堂,第五课堂是虚拟空间(Cyber space)上的课堂,这五个课堂共同构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天候、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泛在”课堂。

不如和大师走几步”。人文社科类学科需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师点拨、戳破“最后一层窗户纸”、领会学问之要义更是学术道路上求之不得的珍贵宝藏。

作为北京大学第一个参与试卷返还工作的人文社科类院系,历史系在本次试卷返还工作中给予了学生和大师走几步”的机会,通过老师给学生的“复盘”,将学生对课程的学习乃至对整个专业领域的认知提升了新的层次。试卷返还带给了学生们“再学习与再思考”的正能量。



唐利国同参加试卷返还的学生进行论文点评。

给考卷一次“复盘”的机会

——北京大学历史系试行试卷返还新制度

■本报通讯员 张昕扬 卢晓东

而完善自我的机会。

北京大学经过认真反思,正在逐步探索试卷管理的新制度,那就是与保存试卷逻辑完全不同的试卷返还制度,该制度仍处于实验阶段,目的是通过在个别院系试行、反馈并逐步完善。试卷保存制度下,考试结束,学习几乎就结束了;试卷返还制度下,考试完成试卷返还后,重要的学习仍在持续。

2016年1月,在化学学院、心理系之后,北京大学历史系作为第一个人文社科类院系参与到试卷返还试点工作中。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利国开设的《日本思想史》课程试卷返还工作在1月5日上午10点至12点进行。唐利国今年刚刚来到北大历史系工作,这位本科就在北大历史系就读的老北大人对母校充满着感情,对自己的学生充满着关怀和责任心,愉快地接受了试卷返还的试点工作。

据悉,除《日本思想史》外,本学期历史系参与试卷返还的课程还有陈侃理的《魏晋南北朝史专题》、赵冬梅教授的《中国史学史》、何晋的《中国历史文选》、张新刚的《古希腊罗马史》、王元周的《韩国史通论》和《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两门课程以及李新峰的《中国科举史》等八门课程。

一次“复盘”现场

唐利国开设的《日本思想史》是历史系专业选修课,共有13名学生选课(含双学位学生),分数的考核方法是平时成绩占10%,期中论文成绩占30%,期末论文成绩占60%。这次试卷返还活

动,选课学生可以在上午10点至12点间自行参与,除该时段有考试的学生,其他学生在该时段内陆续前来。唐利国将他批改的期末论文返还给学生,先是按照批次和学生在考试成绩、听课感受等方面同学生们进行总体交流。

谈到听课感受时,一位学生发出“唐老师您读书太多,思维跳跃太快,我总跟不上您啊”的感叹,引发同学们一片笑声。总体交流之后,唐老师对学生在论文的学术规范、论文观点、论文逻辑等多方面进行一对一的讨论和指导,整个过程非常细致。

学生拿到唐利国批改返还的期末论文,有些连个别词语、甚至标点符号都进行了认真批改。唐利国和学生就文章的每一处批改都进行了讨论,学生也不时提出问题与思考,唐利国进一步解答,两人再共同探讨,一来一回中学生可谓受益匪浅,试卷的“复盘”作用初步发挥出来,学生们对该课程的学习进一步升华。

从唐老师与学生亲切热烈的交流中,学生充满敬仰的“吐槽”中以及唐老师同学生严谨细致的“试卷复盘”中,师生有了进一步深入的交往。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中国大学评论

近日,河南大学的一位讲课深受学生欢迎的老师退休后被校方返聘,并且是由讲师高聘为副教授,这也让人们看到了教师课堂教学的魅力。但媒体对此的报道和解读,却容易产生误导。

比如报道中说,这位老师“为本科生讲了32年古代文学,任教期间不出书、不发论文、不申报职称,只专注教学。”(《中国青年报》2015年1月16日)在这里,“不出书、不发论文”与“专注教学”显然是对立的。从后面的报道中可以看出,记者着重强调这位老师将出书、发论文的时间全部投入到教学中,因此才赢得了学生的喜爱。也许这是为了批评时下大学“重科研、轻教学”的偏颇,但如此这般地建构出一个对立,等于把大学教师还原成了中小学教师。

就笔者记忆所及,类似表彰大学教学的报道还有很多,诸如重奖教学为主的教师,设立教学改革项目,举办各级各类的教学评奖以及不分青红皂白地安排许多学生助教等等。这些具有轰动效应或示范效应的举措,就其本质而言,只是在向世人展示“重视教学”的姿态,并无实际的价值。

原因很简单,它们的背后都有行政主导,是行政管理部门在其管理上出现“重科研、轻教学”的问题后的一种自我补救措施。这种绕过教师和学生而作出的决定,从根本上说,乃是大学过度“行政化”的又一产物。在这些举措的酝酿、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甚至在某门课的教学内容和评判标准上,教师和学生的发言权都十分有限。这样下去,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不可能被调动起来的,而没有教师和学生参与的教学改革也很难取得实效。

现在看来,以树立“典型”来表彰大学教学的方式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普遍于多数教师,由于过度地渲染,它的榜样效应也变得微乎其微。

教学与科研的一大差别是,前者不像后者可能体现在一个突出的“点”,而是更多地体现在一个“面”之上。在课堂教学方面,哪怕是科研突出者,限于个人的精力,其辐射的范围也不可能像他的科研成果那样广,因此就需要有更多的教师去分担教育或教学的责任。这部分处于“中层”的多数教师往往决定了一所大学的教学水准。不重视广大“中层”的教师,不普遍地给予实际的鼓励和资助,表彰再多的“典型”,也无济于事。

笔者以前曾多次撰文谈及大学教学的问题,总结成一句话,即不要矫枉过正。具体地说,就是不要因为出现了“重科研、轻教学”的问题,就片面地高扬教学而全盘否定科研在大学以及教师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也不要为了保证科研产出,而让科研能力强的教师脱离教学岗位。

现在看来,矫枉过正的情况还不止这些。在教学第一线打拼的教师都会有一个感受,如今的大学课堂上,学生的“抬头率”较之十年前要低很多。看手机、发微信、听音乐者有之,睡觉者有之,复习外语者有之,还有一些是说不清、道不明地凝眸桌面者。我们可以笼统地称之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后遗症。

于是,让学生在上课前上交手机成了有的学校教务管理部门采取的对策。不过,上交手机后,学生还可以选择睡觉;还可做别的与课堂教学无关的事。这类简单粗暴的所谓治标之策,效果似乎并不理想。

一些教师则想出了另外的办法,就是增加一些近乎低级趣味的“噱头”,或做出网络上流行的夸张动作,以引起学生注意,希望促使其抬头。或者干脆以中学的教学方式来迎合学生的“学习习惯”。

问题是,这类变相的矫枉过正在取得表面的效果的同时,也削弱了大学教育的基本功能。

应该看到,现在的大学生较之以往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象牙塔”被打破后,他们一方面以世俗化为时尚,一方面知识面狭窄、社会经验欠缺。如果一味地迎合,大学对学生人格的塑造和研究能力的培养功能便不复存在,结果只能是让大学走上“后中学”的歧路。

我们以前经常听到“让教育家办学”的呼吁,其实,教学最应该从过度“行政化”的圈子中走出来,让教学的承担者、课程的主体——教师——成为教学主人的同时,也让教学管理部门回到“服务教学”的本职之上。

新闻报道固然需要取得一定的效应,但越接近于实际的新闻越有公信力和感染力。新闻的原则是如此,大学又焉能例外?

表彰大学教学也不可矫枉过正

尤小立